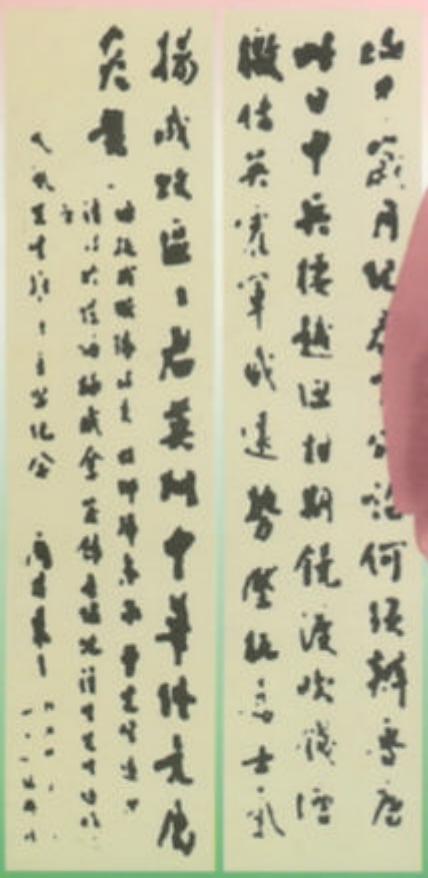
周恩来
烽火东南行

龙彼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烽火东南行

一烽火连三月

1937 年 12 月 24 日，浙江省会杭州沦陷。接任不到二十天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于前一天的晚上离开杭州，沿公路线过桐庐、建德，向兰谿、金华方面转移。也就在这一天晚上，钱塘江大桥被炸毁，全市停水、停电，全城五十多万人中有近二十万人被迫疏散、逃难。

国破家亡，到处是一片兵慌马乱的景象。

随着“嘎”的一声，前面的大卡车停住了，黄绍竑乘坐的轿车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把坐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的黄绍竑弹起来，额头重重地撞在车篷上。

“你没事吧？”坐在旁边的黄夫人蔡凤珍关切地问道，同时伸过手来摸摸丈夫的额头。

“我没事。”黄绍竑拍了拍妻子的手背，感激地说，他整了整风纪扣，对前座叫道，“陈副官，到前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了？”

少尉副官陈亦南连忙推开车门，向前跑去。

前面公路中间围着一大堆人，一个瘸腿老汉倒在地上，一对年轻夫妇正搀扶着他慢慢坐起身来。

开大卡车的司机就站在他们的跟前，破口大骂：“老不死的，你眼睛瞎啦？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队，就懵懵懂懂横穿马路！你丢了老命不要紧，耽误了我们长官的公务，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那年轻丈夫不服气地顶道：“什么责任不责任，大家都在逃难，犯不着吹胡子瞪眼睛的。”

站在旁边的一位商人提醒道：“他们是省政府车队，得罪不起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使性子。”

那年轻妻子更火爆，接嘴道：“省政府车队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的话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干一场，何必当缩头乌龟到后方来跟老百姓撒气！”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瘸腿老人可吓坏了，连连摇手道：“先生，夫人，快别说了，全是我不对。我一听车笛就懵了，辨不清方向，本来是靠边站却错成横穿马路，阻塞交通……我向这位老总陪罪了。

而司机老总却不依，指着那对夫妇的鼻子，跳脚吼道：“你们好大的胆子，敢骂我们黄主席是缩头乌电，老子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们，就是我姑娘养的……”他返身从驾驶室里拿出一根摇杠就要揍人。

“你想干什么？”陈亦南急忙上前，加以阻拦。

“哦，陈副官，这两个出言不逊，诬蔑党国，我猜他们八成是共匪……”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共匪’、‘共匪’的，小心破坏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你小子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他们骂人，也不管吗？”

“算了！”

“好，我听陈副官的。”司机说罢，便钻进了大卡车的驾驶室。

陈亦南转向那位瘸腿老人，亲切地问：“老先生，请问仙乡何处，府上哪里？”

老人这时已站起来，回答道：“鄙人祖籍杭州，家住十五奎巷。由于躲日本鬼子，走得匆忙，与家人失散了。”

“原来这二位不是你的儿子、媳妇。”

那年轻的丈夫接口道：“我们是上海人，从嘉兴方面逃难过来的。请问这位副官。为什么你们浙江省政府也不抵抗，就把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拱手让给日本鬼子呢？”

陈亦南说：“不是我们不抵抗，而是整个战局所致、战略所需。我们黄主席是主张抗日的。今年他在山西就指挥过与日本鬼子的战斗。打过几场硬仗。这次奉调浙江不久，刚刚跟朱家骅朱主席办完接交手续，还来不及部署。请相信，我们会收复杭州，收复失地的。”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老百姓就放心了。”瘸腿老人和那对夫妻异口同声地说。

遣散了逃难的人群，疏通了前进的道路，陈亦南回身向轿车走去。他发现黄绍竑夫妇正站在车前，向他微笑。

“钧座，情况是这样的——”陈亦南开口就要汇报。

黄绍竑摇了摇手：“我都知道了，你回答得很好，对民众我们就是要积极做工作。”

车队启动之后，黄绍竑靠在后座的软垫上，又陷入了沉思。

黄绍竑两次主浙。第一欢是在 1934 年冬至 1936 年冬。由于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又是国民党内部 C·C 与复兴社两大派系倾轧的大本营，作为桂系四巨头之一的黄绍竑①，处在蒋桂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经常受到 C·C 与复兴社两派的进攻与包围。别看这两派平时争风吃醋，相互排挤，纠葛不断，可在对付外来官员特别是桂系方面，却能联合一致，“同仇敌忾”，致使黄绍竑有抱负也无法施展。反被攻击调离，而将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交给了 C·C 健将朱家骅。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由于抗战爆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浙西沦为战区，南京势将不守，蒋介石对浙江的控制已大大放松，这对黄绍竑来说正是大好时机。所以。当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呈请辞职，蒋介石又要黄绍竑去浙江主事，黄便欣然答应了。其时，黄在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①，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接到任命，先到武汉作了交代，再沿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营的旗号，带着阎锡山送给他的警卫营一营南下，于 12 月 17 日到达杭州。18 日，即与朱家骅办理了交接。家未安稳，坐未暖席，便又撤离了杭州。

“对，陈副官说得对，我们要收复杭州，收复失地，我们会收复杭州，收复失地的！”黄绍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起右掌向前排靠椅拍去，仿佛那不是靠椅，而是占领杭州的日本兵。

“叭！”

随着一声脆响，陈亦南被弹跳起来，脑袋碰在车篷上，不由得惊叫道：“钧座，你怎么啦？”

“哎呀呀，失手了……”黄绍竑伸出双手按住陈亦南的肩头，帮他在座位上坐稳，并歉意地说。

还是蔡凤珍最了解自己的丈夫，她顺着黄的思路启发道：“怎样做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呢？”

“概而言之，是三句话：发动群众，刷新政治，掌握武装力量。”

“发动群众？”初听这个名词，蔡凤珍有点吃惊，但她脑筋一转便释然了，她叫着黄绍竑的字说：“季宽，你大概又想起了山西娘子关那场战役吧？”

“可不是吗，吃个甜枣记一下子，打个败仗记一辈子。那场战役我吃了亏，被狗日的日本鬼子重重包围，差一点儿全军覆没。要不是八路军及时增

援救助，我哪有今天乘车与你讲话的份儿？人家中共对合作抗日就是诚心，他们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办法也真灵，要打开浙江的局面，非得向人家学习不可。我已经向周恩来先生正式提出，请他派一些人来帮帮忙。他答应了，并不指明是哪一个，当然不止一个。”

“周恩来先生挺喜欢吃我烧的武昌鱼的，他要能来一趟浙江该多好啊！”蔡凤珍忆起往事，有些激动。

“来浙江？恐怕办不到吧！他可是中共方面的头面人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呀！”

“他不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吗？”

“一语成谶，但愿夫人，不，我们的愿望不会落空。”

黄绍竑到达金华，刚把省政府机关安置好，蒋介石派白崇禧会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到了。他们于 12 月 28 日召开了一次军政紧急会议，对浙江的军事和政治作了新的部署，同时还推定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要他组织部队，深入陷区，展开游击，对敌后作有效的活动。黄绍竑便把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营改组为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设在金华城内成美女子中学），并把从山西带来的警卫营改编为游击总部的特务营，还派人四出招兵买马，建立部队。

按照黄绍竑的计划，从杭嘉湖撤退下来的军警，都改组成游击队伍。所谓撤退下来的军警，即省会公安厨长赵龙文带出来的武装警察、内河水上警察局长朱炳熙带出来的水警队、翁光辉的诸新嵊游击总队、徐图远在松阳一带搞起来的自卫队。此外，还收容了由前方失散下来在金华兰谿一带的散兵游勇。很明显，这批士兵都是军警中的“老油条”，成分复杂，战斗力薄弱，所以 C·C 和复兴社的人都称这支队伍是“乌合之众”。

然而，黄绍竑热情未减，于 1938 年 1 月中旬在永康县召开了“全省士绅会议”，以图“刷新政治”。所谓“士绅”者，无非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当时还没有书记长）、县商会会长和其他告老还乡的官僚等。这些人参加会议的目的，与黄绍竑的要求并不一致，一般都是到战时省会来探听时局的消息，窥测省政府当局的意图，以便决定今后的对策与行动。在会议上也有唾沫飞溅，慷慨陈词的。但尽是些空洞无物的高调，无法兑现的虚论，散会之后，各有各的打算，对抗战动员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推动作用。

黄绍竑眼见这个会议没有收效，便决定以“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名目（简称政工队），把流亡的爱国知识青年组织起来，进行战时宣传和抗日动员工作。他首先跑到兰谿，指示县长陈佑华召集退到该县的流亡青年举行座谈会，并亲自与他们谈话，宣布组织政工队的设想，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青年都表态乐意参加政工队。黄绍竑又叫他们各写一份自传，测验他们的学识与意向，作为甄录的依据。浙江第一个战时政治工作队就是通过这样简便易行的手续，于 1 月下旬成立了。

有了样板，立即推广。2 月初，金华、义乌，永康等邻近县的政工队相继成立，并很快地普及到全省其他各县。

2 月下旬，黄绍竑以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陆续制订了四个法规，颁行全省各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和县政府。这四个法规是：

1.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

2.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员守则；

3.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工作实施纲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补充规则。

4 月，浙江后方地区绝大多数县份都建立了政工队。为了总结各个政工队的组织与工作的经验，鼓舞工作情绪，统一工作步调，以便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政治工作高潮，黄绍竑专门召集四区（即金华专区）所属及其邻近交通较为方便的诸暨、萧山、绍兴、嵊县等十多个县的政工队全体人员约近一千人，在金华监狱内举行初次集中训练。为了不让 C·C 和复兴社分子插手，他亲自主持，并派定助手和所有训练工作人员。集训了两个星期，黄绍竑从受训人员中抽调了青年男女 16 人，组织了一个战地政工队，由省抗卫会直接领导，深入浙西沦陷地区开展敌后政治工作，其余人员仍各回原县工作。

黄绍竑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 C·C 与复兴社分子的不安与惊恐。他们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嘹亮雄壮的抗战歌声，感到刺耳；他们看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拥护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等墙头大字标语，感到刺目，一致认定：他们的政敌黄绍竑重回浙江，与共产党有勾结，并且已在省县各个部门起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分子。

首先他们攻击游击总部。游击总部的产生，是由白崇禧在金华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时决定的，事前并未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请示过，所以这一组织始终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承认。为 C·C 分子把持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便就这个组织向黄绍竑提出质问：“游击总部是干什么吃的？没有军事委员会的承认，算不算‘私生子’？”“第三战区长官部认为浙江的国防，已由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负全责，早已形成了一个指挥系统，不必并驾齐驱的来一个第二者插手，以免意见分歧，权力分散。”“既然是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那么，总部和所属部队的全部经费，应该由第三战区长官部统筹开支，不应由浙江负担。如果长官部不出钱维持，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组织，应即予以裁撤。”

其次，他们诬蔑政工队。说什么“政工队乃是赤化青年的反动组织”；“是黄绍竑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搞的招兵买马”。黄绍竑为安定人心，动员民众，贯彻中央抗敌自卫的国策，而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成了他们指责的目标。如 C·C 头目、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就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中央的抗战纲领还没有制定，浙江省先单独制定？名称为什么不用施政纲领而用政治纲领？岂不是想把浙江当作独立王国吗？”

在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上，C·C 与复兴社也极尽捣乱破坏之能事。黄绍竑设置了“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简称政训团）”与“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青训团）”，并亲自担任两个训练团的团长，但两团的副团长都是 C·C 分子，训练实权一开始就落入 C·C 手中。黄绍竑虽然兼了全省保安司令，而指挥保安团队的实权，却操在保安处长兼副司令宣铁吾的手里。宣铁吾是复兴社中的主要骨干分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蒋介石的侍卫长，常自诩为“老头子身边的亲信中的亲信”，蒋介石门生中的“得意门生”。宣铁吾到浙江是在黄绍竑第一次主政浙江的期间，黄绍竑第二次主浙，宣仍未离开。宣对黄的态度，是外尊而内倨，对黄的意图，是阳奉而阴违。黄对宣的态度，是表面倚重，而心怀疑忌，信之未便，去之未能。

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干扰与倾轧，6 月间，黄绍竑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

报：

“季宽兄，据各方反映。本任政府声名狼藉，须切实注意。
中正。”

“真是岂有此理！”黄绍竑朝八仙桌重重地拍了一巴掌，震得刚泡好的盖碗茶盖翻碗砸，茶水横流。

蔡凤珍吓了一跳，担心地问道：“委座在电文上说了些什么？”

“你自己看吧！”

从丈夫手上接过电报，只扫了一眼，蔡凤珍也激愤起来：“又是恶人先告状，我早说过临时参议会的那几个老家伙不是好东西，还有宣……”

“什么叫‘声名狼藉’。我到任仅仅半年，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怎么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了呢？难道发动群众抗日打鬼子，就是‘声名狼藉’，贪赃枉法、欺男霸女，就不是‘声名狼藉’吗？”黄绍竑在蒋介石手下干了将近十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严厉的责备，气得浑身直打哆嗦。

蔡凤珍听出丈夫话中有话，“贪赃枉法”指的是C·C头目方青儒，“欺男霸女”则指的是复兴社骨干宣铁吾，宣不仅奸险，而且好色，曾经妍居过杭州虹月楼酒菜馆女招待洪碧筠；为了占有杭州清和坊元泰布店老板范某的女儿，他授意参谋主任杨树农派人将范逮捕，逼其以女来缓颊；宣铁吾现在的小老婆何敏，原是杭州吴山路西悦来菜馆老板的女儿，就是被宣先奸后娶的。

“既然嫌我‘声名狼藉’，那我还当这个劳什子的省主席做啥？”

“对，干脆打电报去辞职算了，大不了再回广西去办农场。”蔡凤珍附和道，她忆起1927年的粤桂战争，黄绍竑曾弃官从农，在柳州办了一个种植桐子的农场——“茂森公司”。后来还到香港做过寓公，到南洋一带去漫游过。

“陈副官，”黄绍竑向门口大声叫道，“马上打电报给蒋委员长。提出辞呈。”

早就守候在门口的陈亦南，双脚立正叩了一下鞋跟。应道：“是。”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接受他的辞呈，而在复电中说“耳有所闻。则以之告”，并加以慰留。

“怎么办呢？”一向聪慧的蔡凤珍，手捧复电，也不知所措。

“我去意已决，还是驰往武汉，找委员长坚辞。”主意一旦拿定，便不轻易改变，这是黄绍竑的脾性。

“跑一趟武汉也好，省得人家无事生非，暗箭伤人。”

当月，黄绍竑就到了武汉，托病住在武昌东湖疗养院，过了几天才去见蒋介石面陈辞职原因。

蒋介石说：“季宽呀，不是我怪你，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如何默契……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士绅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要你注意，希望你改正。你仍旧回浙江去吧，不要再辞了。”

黄绍竑专门解释了一下“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我觉得在国家空前

大变的全面抗战时期，政治上必须有一个崭新而为大众所拥护的政治纲领，作为政府与人民共守共行的准绳。这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制定公布，由于中央忙于搬迁，没有时间考虑，因此，我们便汇集各方面的意见拟订了……”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那纲领的末尾，关于巩固抗日战线的一条，终是欠斟酌吧？”

黄绍竑要求继续组织和发展青年政治工作队。

蒋介石答复：“青年是要组织的，但在国民党中央的青年组织①没有健全以前，你组织起来岂不是替共产党组织，供他们利用？以后一定要由三青团统一。”

黄绍竑本来还想赖在东湖疗养院不走，适值李济深闲着，也住在那里，不久李宗仁由台儿庄回来，也住了进来，白崇禧也时常来闲谈，惹出了许多谣言。为避“桂系聚会”之嫌，黄绍竑于7月下旬返回浙江。

既然辞职不准，黄绍竑就利用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发动并加强民众自卫组织”的有关条文，把原有的游击总部和游击队伍，编为抗敌自卫团队。

10月，武汉失守，中央政府迁往重庆，山高皇帝远，蒋介石管不了浙江许多，黄绍竑利用这个机会，不仅扩充自卫队，而且办起了兵工厂。

紧接着，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全国抗战形势开始逆转。

就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的浙江。

黄绍竑夫妇大喜过望，一齐惊呼道：这是真的吗？

二　欢迎周副部长

1939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还不过 3 月中旬，桃李花已经盛开，红的似鲜血，白的如雪片，把一个战时的金华打扮得花枝招展，不能不使人想起“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的诗句。

金华，因“ 金星与婺女争华 ” 而得名，位于浙江中部偏西，是沪杭至湘赣的必经之地，向来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浙江省政府移设金华附近的永康方岩，金华已成为战时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一天丽水到金华的长途汽车晚点，快到傍晚时分才进站，从风尘仆仆的车中，走下来一个戴淡墨色眼镜的商人，他就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一个卖香烟的小姑娘跑上去，用清脆的嗓音叫道：“ 老板，要香烟吗？白金龙，大前门，老刀牌…… ”

刘英客气地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不会抽烟。

一个衣衫褴褛的瞎眼老妇扶着一个半大的拖鼻涕的孩子，求告道：“ 先生、老板，行行好…… ”

刘英从长衫中掏出一把铜元。放在那只伸出来的手掌中。

他心中有些酸楚，长久不来金华了，金华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贫苦……

刘英匆匆地出了车站，按照金衢特委的安排，住下旅店后，当晚便到紫墩巷 15 号省委文委机关住所，找骆耕漠、邵荃麟、葛琴三人了解工作。

骆、邵、葛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刘英，对他多年来在闽浙边同粟裕一起领导和坚持革命武装游击斗争十分敬仰，都惊讶地说：“ 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

刘英兴奋地说：“ 听到这么大的喜讯，我怎能不来呢？ ”

骆耕漠说：“ 你是指周副主席要到金华来吗？ ”

“ 可不是咋的， ” 刘英接过葛琴递过来的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说，“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 ”

“ 是的。 ” 邵荃麟答道，“ 消息是从新知书店咱们的秘密交通站传来的，周副主席已视察完新四军军部，即将从岩寺到达金华。 ”

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性文化岗哨，也起着秘密交通站的作用。岩寺在安徽歙县，设有新四军兵站（站长忻元锡），是新四军的一个公开联络点，负有来往人员的护送和物资运输任务。兵站初建立时，因为国民党的干扰和封锁，交通条件极差，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局面才有所改观。如上海煤业工会，经地下党员对一些工商业进步人士做工作，为新四军捐募了七八辆卡车，组成了新四军的交通运输队，往来于温州（是当时浙江通上海的唯一口岸）和岩寺、太平之间，同时也构成传递消息的一条线路。

“ 这事由我们安排好了，你何必冒着风险，亲自赶来呢？万一发生了三长两短，对革命的损失就太大了。 ” 葛琴担忧地说。

“ 刘英同志，葛琴说得对，你的人头前几年可是悬过赏的哦，应该特别注意安全才是。 ” 骆耕漠接着说。他们都为刘英这次秘密来金华担心。

“ 你们看我这身打扮， ” 刘英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抖了抖长袍，摸了摸墨镜，风趣地说：“ 像游击司令呢，还是像省委书记？ ”

邵荃麟说：“ 都不像，倒像个闯过三江四码头的木材商人或银行大亨。 ”

“ 哈哈哈哈…… ” 刘英爽朗地笑了，笑罢，他严肃地说：“ 我偶尔化装

外出，倒不怎么要紧。我担心的倒是你们的安全，你们就在省政府的跟前，长年跟他们打交道，国民党前不久又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刘英同志，请放心，我们的真实身份至今也没有暴露，我们会严守党的机密，注意安全的。”骆耕漠是文委书记，他代表三人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如何欢迎周副主席吧！”刘英招呼三人坐下，同时将座椅朝前挪了挪。

“好的。”骆耕漠答应道，“金衢特委、金华县委和我们省委文委昨天专门开会研究过。大家商定，由特委负总责，县委具体负责组织群众欢迎，文委负责进行上层活动。”

“知道周副主席住什么地方吗？”

邵荃麟说：“我已打听清楚了，周副主席在金华逗留期间，将安排在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的宾馆休息，该宾馆位于金华城外的火车站附近，是金华最好的旅社。”

“国民党方面有什么动作？”

“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准备派党、政、军方面的上层官员，在宾馆迎候，还要设宴为周副主席洗尘。”

刘英站起来，沉思着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对三人说：“周副主席这次来浙江视察，是我们浙江党内的一件大事。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然要与国民党的省主席和党、政、军各方面的要员打交道。但他又是我们的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将代表党中央检查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赶在国民党组织的欢迎前面，及早迎接到周恩来同志。”

邵荃麟建议道：“是不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我与金华县委的杜麦青同志负责组织群众，到金华火车站西边公路上的一座小桥侧，欢迎周副主席的专车；另一路由骆耕漠以《东南战线》月刊总编辑的公开身份，去宾馆迎候？”

刘英说：“这个设想是可行的。但欢迎的群众不能是一般的群众，应该是有觉悟的骨干分子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

邵荃麟说：“我明天一早就通知《浙江潮》、《战时生活》、《刀与笔》、省儿童保育会、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抗日救亡歌咏队、金华读书会等团体，让他们各派出七八位代表好了。”

“行。”刘英转向骆耗漠：“你不要单独一人到宾馆去，应该找几位积极抗日的民主人士一道去。”

骆耕漠回答：“好的。”

“日本特务机关和杭州汪伪政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会不会也得到消息，有所行动呢？”刘英缓慢地说，像是在问他们，又像是在问自己。

骆耕漠说：“金衢特委与金华县委尚未接到这方面的情报。”

邵荃麟说：“我们《东南战线》月刊最近接待了一位从杭州沦陷区来的同志，亦未提到日本宪兵队、‘梅机关’以及汪伪的‘四十六号’有什么异常活动……”

刘英说：“这种事情是极端机密的，一般人不会知道。”

葛琴说：“也许敌人压根儿也不晓得周副主席来东南前哨视察吧？”

“不，我们不能这样估计，这会使我们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刘英严肃地说：“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飞机空袭，武装骚扰，甚至于派人暗杀……一定要向接待的同志们讲清楚，即使牺牲个

人的生命，也要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

邵荃麟说：“我一定把这个精神告诉给大家。”

骆耕漠说：“我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周副主席。”

葛琴说：“这也是我的态度。”

刘英禁不住激动起来：“等周副主席一到，我们就召开省委工作扩大会议。请周副主席作指示，全面部署今后的抗日工作……浙江的革命历史马上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骆耕漠关切地说：“刘英同志，根据目前的形势，你还不能公开露面。欢迎周副主席。你就不要去了吧！”

刘英答道：“好的，我准备让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光焕同志参加。”

就在同一天晚上，在省保安处处长兼 91 军军长宣铁吾的官邸，几个人头挤在一起，也在商议周恩来到金华的事。

三角眼的密探组长说：“浙江是我们委座的天下，共产党周恩来跑到这里来做啥？”

吊梢眉的特工科长说：“还不是仰仗他那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以视察抗日和回绍兴省亲为借口，行联络浙江共党分子之实，煽动民众，蛊惑人心呗！”

“那为什么委座来电，还要求‘热忱欢迎，保障安全’呢？”

“这个，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全身陷在沙发中、正吞云吐雾的宣铁吾，从怀中掏出一封电报，扔给了吊梢眉。

几个脑袋一齐凑了上来。

吊梢眉手捧电报如捧圣旨，一字一板地念道：“惕我吾师，奉委座口谕：周恩来即日来东南视察，并回绍兴省亲，希热忱欢迎，保障安全。严密监视其言行，特别注意浙江异党的活动和黄周会晤。生雨农”

三角眼听了，仍然有些迷惑不解：“又要热忱欢迎，又要严密监视；又要保障安全，又要注意异党活动和黄周会晤。岂不是矛盾吗？”

宣铁吾用右手食指掸了掸烟灰，不耐烦地说：“这就叫政治家风度。文章写在明里，工作做在暗里，又拉又打，外宽内严……”

“究竟以哪一个为主呢？”

“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以严密监视为主。”

“哦，我懂了。欢迎的事情，我们不用管，放给黄绍竑他们去做。我们只要盯牢他们的一切活动即可，稍有越轨之处，立即向委座或戴老板报告……”

宣铁吾对这个机械地理解他的意图的下属不置可否，转而向吊梢眉吩咐道：“黄绍竑现在还在天目山，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三五天内回不来。关于周恩来明天要到金华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让他府邸上的任何人知道。这样，也可以推迟或取消黄周的会晤。”’

吊梢眉恭敬地答道：“是。”

三角眼还没有回过味来，主动关心地问：“处座，黄绍竑不在，是不是你亲自去会周恩来？”

宣铁吾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不去会他。黄绍竑与刘建绪早已安排了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与抗敌自卫团司令部参谋长张绍棠二人全权代理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听说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当过处座的老师？”

“你还有完没有？”宣铁吾将抽了一半的香烟重重地按熄在烟灰缸里，大声吼道：“我对你多次讲过，不要耍嘴皮子而要用脑子，不要捕风捉影而要抓事实，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三角眼没想到讨了个没趣，连忙闭嘴，不吱声了。

还是吊梢眉会察颜观色，立即转移话题：“报告处座，今日金华街头，发现了一些不明身份者。”此话果燃引起宣铁吾的职业性的反应：“是不是共党分子？有没有他们的省委书记刘英？”“他们稍纵即逝，暂时还不清楚。”

“你负责查一查，如发现是刘英或其他首要分子，设法引到无人处，秘密逮捕。”

“是。”

“我估计，共产党肯定要组织一批群众去车站欢迎周恩来，你们得派几个弟兄混进去。”宣铁吾对另外两个部下说。

“是。”

“周恩来将下榻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政府官员明日下午要到那里迎候，你们也跟着去。”

“是。”

“至于你，”宣铁吾转向三角眼说，“马上通知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就说是我的意见，要他们从明天开始，将周恩来在浙江的一切活动逐日记录下来，随时准备上报中央，你们密探组配合他们的行动。”

“是。”

3 月 17 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早就空出来的四间上等客房，已被打扫数遍，布置一新。

勤杂工小杨问女招待小方：“你知道新来的客人是谁吗？”

小方是个年轻、爱美的姑娘，正把一束李花插进写字台上的花瓶中，她答道：“不知道。只听说打从重庆来，好像是个大官，待人挺和气的。”

“我可知道他的来历，他叫周恩来，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你怎么知道的？”

“是《浙江潮》主编严北溟先生告诉我的，他还叫我关照一下你，一定要侍候好周副部长，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去找他。”

“哦，周恩来，周副部长，‘西安事变’就是他去解决的，他可是个大智、大勇、名闻中外的大人物呀！我能够侍候他，太幸福了！”小方沉浸在激动与向往中。

中午刚过，浙江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第十集团军等各方要员或代表，以及民主人士、《东南战线》月刊总编辑骆耕漠等都来到旅行社，等待周恩来的到来。

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批欢迎群众则向城外走去。他们中间，有《东南战线》社的邵荃麟、葛琴、徐进、毛冷，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沈馥，《浙江潮》主编兼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政治指导室主任严北溟，《青年团结》社的胥哲夫、匡莘芜、杜青野，文化资料室杜麦青、查民愈，县政工队的徐旭，第四区专员公署的王耘庄，《妇女战线》社的丁浩及其他机关人员，还有汪光焕等，约四五十人。他们一直走到金华火车站西边公路上一座小桥的

西侧，才停住。

桃花如火，李花赛玉，烂漫的春色使严北俱十分兴奋。他激动地对邵荃麟说：“荃麟兄，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周副部长啊！”

“说得对，”邵荃麟答道，“周副部长这次来金华视察，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确实值得我们同声庆贺。”

“你见过周副部长吗？”

“见过。那还是在 1927 年底，在上海。一晃十二年，不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不如你幸运，只在斯诺先生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过他的照片。身着戎装，骑在马上，英姿逼人，真一代伟人也！”

汪光焕与杜麦青也在交谈。

杜麦青说：“我们设想，周副主席上午从太平岩寺乘车出发，到金华大约是下午二三点钟；我们还设想，他有可能是坐小卧车或吉普车来金华，那么就会必经此桥……”

汪光焕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现在是二点三十五分。怎么还不见车影呢？”

“等一等吧，再过半点钟就会到的。”

这天下午公路上的车辆不多，来来去去的不过是些货车与敞篷车。间或有几个做小买卖的商人经过，也是肩挑、背背、汗流浃背、忙忙碌碌的样子。问问他们看见过小卧车或吉普车没有，都是千篇一律的摇头。过了半点钟，没有踪影。

又过了半点钟，依然没有踪影。

欢迎队伍不由得焦急起来。

邵荃麟问严北溟：“周副部长来浙抵金的通知，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严北溟说：“是第三战区下达给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我从总司令部听到的。”

“按理不会有什么偏差吧？”

“我想是不会的。”

汪光焕比别的人更着急，因为这批欢迎群众名为抗敌自卫团所组织，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起主导作用。他受刘英委派，做这支队伍的暗地组织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周副主席的安全了。

他问杜麦青：“不至于出什么事吧？”

杜麦青答：“不至于。”他嘴上如此说，心中更没底。

终于出现了一辆吉普车，但方向不对，是从金华火车站那边开过来的。车子开到小桥边，“嘎”的一声停住了，从车窗口探出一个脑袋。对严北溟招呼道：“严先生，周副部长久等不到，在旅行社迎候的人都等急了，张参谋长派我到前面去看看。”

严北溟认得那人是自卫团司令部的马副官，忙回答：“马副官，你去看看最好，说不定还能接到周副部长呢！我门仍在这里等你的消息。”

随着“嗵隆”一声，吉普车开过小桥，向兰溪方向驰去，迅速消失在前方迷濛处。

人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方始见到车影，近了，近了，略有疲惫的人们又兴奋起来，争着拥上桥头。

汪光焕问杜麦青：“你看是吉普车吗？”

杜麦青年轻，眼睛尖，答道：“是吉普车。”“几辆？”

“一辆。”

“怎么是一辆？”

严北溟走过来说：“好像就是刚才那一辆，是马副官回来了。”

“马副官的车？”人们的心头不由得一沉。那车越开越近，看得清车头的国旗与党徽，随着“嘎”的一声，车停在小桥上，跳下来的果然是马副官。

“怎么，没迎到？”严北溟问。

“是的，没迎到。”马副官答。

这时，从火车站方向传来了摩托声，尘土过处，一个勤务兵高叫道：“严先生，马副官，总部刚刚接到兰溪来电：‘周今日不能来金’。张参谋长叫你们回去，让欢迎队伍解散。”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三 “一切为了抗日”

就在欢迎队伍解散不久，标号为 07、203 的二辆大卡车出现在公路上。车里乘坐的有周恩来、随行副官邱南章（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少校科长）、警卫员刘九洲，以及新四军曾秘书、科长张金铎夫妇、中国茶叶公司屯溪分公司主任章秋阳、新四军速记员吴波等。

原来从皖南云岭到浙江金华，道路崎岖，要涉河越岭，经茂林到太平县后，才有公路通车。周恩来到太平时，发现附近有国民党驻军，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机立断，同随行人员一起乘新四军兵站预先准备好的二辆大卡车，直奔金华。6 时进城，在大东旅社开了三个房间。

虽然经过了一整天的长途跋涉，周恩来却无一丝一毫的倦意。他兴致勃勃地说：“谁跟我到军人服务部去一趟呀？”

“我去！”

“我去！”

好几个嗓门同时应答着，随行人员中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青春的热情与旺盛的精力。

军人服务部在金华铁岭头 10 号，刚进门，就碰到该部歌咏队队长刘良模。刘惊喜地说：“周副主席，骆耕漠和邵荃麟他们等你一下午了！”

“是吗？”周恩来也有些意外，他急着来军人服务部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的，连忙说：“快把他们请来！”

骆、邵二人闻讯，别提心中有多么高兴。邵荃麟虽因肺弱，身本不好，但仍喘着粗气，不断加快步伐。

铁岭头 10 号原是教会的房子，环境优美，地方宽敞，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只留有看房子的人。刘良模因有教会关系。得以借用为军人服务部的住所。刘的办公室虽然比上海居民普通洋房的客堂大一些，但放了一张大写字台后，也只能坐五六个客人。邵、骆二人赶到时，室内已有十多个人，全部站立着，房间显得很挤。

邵荃麟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军大氅，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雪亮的眸子，由于刚刚刮过胡须，下巴上和脸颊边青里泛红，不觉热血翻涌，紧走了几步，一把握住了那双向他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周恩来摇了摇对方的手，高兴地说：“荃麟同志，我们大概有 12 年没见过面了吧？记得那次分手时是在上海……”

“周副主席的记忆力真好！”邵荃麟赞叹道，抽出一只有手，将骆耕漠拉到写字台前，向周恩来介绍道：“他就是骆耕漠，公开身份是《东南战线》月刊总编。”骆耕漠向周恩来鞠了一躬，说：“周副主席，路上辛苦了！”

周恩来微笑道：“我们再辛苦，也不如你们坚持在抗日前哨的同志辛苦呀！”说着朝对面一位同志一指：“你看看他，是不是你在上海就相识的老朋友？”骆耕漠眼睛一亮，这不是章秋阳——章乃器的胞弟吗？不禁喜出望外：“秋阳兄，你什么时候到的金华？”

见到老朋友，章秋阳也很高兴：“才到不大一会儿。我是同安徽省地方银行的一位稽核一起来金华出差的，正好与周副主席同路，顺便也参加了护送的工作。”

骆耕漠想起了在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的人，忙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

旅行社里已为你准备好了房间，还有十几位国民党省级党政军要员在等着迎候你呐！”

周恩来问：“要员中有哪些人？”

“有省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参谋长张绍棠、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骆耕漠扳着手指头，一一报告道，“他们中午就到了旅行社，一直等到现在，你再不去，他们就要散了。”

周恩来笑道：“他们大概不会想到，我会一竿子插到底，插到金华的基督教军人服务部刘良模队长这里来了。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旅行社。”

房子里的人都开始往外走。

周恩来走到门边，指着一台家用式木盒大收音机，对刘良模说：“良模同志，你们有大院子，有小花园，有收音机，真有点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味道，工作条件不错嘛！”

刘良模说：“多承周副主席夸奖！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哩！”

周恩来走到院子里，接着说：“军人服务部和歌咏队都是抗日必需的重要工作。组织群众学习抗战歌曲，用歌声来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很受广大群众欢迎。你们要努力克服艰难险阻，好好地干！”

刘良模和队员们齐声说：“我们决不辜负周副主席的教导，一定加油干！”

周恩来微笑着点点头，步出 10 号大院，向大家挥挥手，便登上了停在门前的大卡车。

尘头起处，刘良模和队员们一叠声地喊着：“再见！再见！”

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宾馆。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的国民党浙江省党政军要员们已经走掉了一部分，但张绍棠、徐旨乾二位参谋长尚未走，从城外公路小桥处回来的严北溟、马副官也在这里，他们听到周恩来已到金华的消息都很兴奋。

会见是在热烈盼气氛中进行的。因为天色已晚，张、徐二位寒暄了一阵就告辞了。严北溟也跟着退出，打算第二天再来造访。刚刚到家，外面响起汽车的引擎声，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严先生，刚才人多，不便单独留你，现在客人都走了，周副部长请你去谈谈。”

“我没听错吧？”严北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是周副部长派我来的，车子就停在巷口。”

“好，那咱们走吧！”

“你不需要加件衣服吗？”

“不需要。”严北溟连礼帽也不戴就朝外走，周副部长要单独按见他的决定使他激动不已，全身热得就像一个火炉。

再度来到旅行社，果然客人们都走了，客房里静悄悄的，四下无人。严北溟看见对面一扇门半掩着，便信步走了进去。只见周恩来正坐在一张小凳上就着一只木盆在洗脚。

周恩来抬头看见严北溟，笑着招呼道：“对不起，对不起，你先到客房里坐一下，我马上就来。”他三下两把擦干脚，穿上鞋立即来到客房，请严北溟坐在沙发上。

邱南章恰在此时端来了茶点，放在茶几上，又退了出去，并顺手关上了房门。

“北溟兄，你的情况我们早有了解。你为人正直，爱憎分明，为团结抗

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主编的《浙江潮》周刊也是不错的，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在民众中有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时年 41 岁，比严比溟大八九岁，却开口称呼他“北溟兄”，这使严北溟十分感动。他答道：“谢谢周副部长的慰勉，北溟才疏学浅，还有许多事情想做而未做哩！在这国土沦丧、国难当头之际，只要周副部长吩咐，北溟即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难得北溟兄有如此热肠赤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浙江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说罢，站起身来，拿过桌上的热水瓶，就要给严北溟续茶。

严北溟惶恐地站起来：“周副部长，这怎么敢当呢？我自己来吧！”

周恩来用左手按住严北溟的肩膀：“你给我坐下！在金华，虽然你是主，我是客；在这间房子里，则我是主，你是客。中国有一句老话，‘客随主便’，北溟兄不是不知道吧？”

“真不好意思。”严北溟只好坐下，听任周恩来为其续茶。

周恩来的和蔼可亲，使严北溟的一切拘束顿时消除，他从两个方面向周恩来汇报了浙江的情况：一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主要是蒋桂之间的矛盾；一是国共之间的地方磨擦，而这两项矛盾又是错综交织在一起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但他力主抗战、容纳进步力量等新政措施，无一不遭到浙江 C·C 系和复兴社分子的反对。

听到这里，周恩来站起来插话：“北溟兄，你能否将协助黄绍竑主席开展工作的情况，讲得具体一点？”

“可以。”严北溟连忙从沙发上站起。

“不，不，不，你还是坐着讲好。”周恩来亲切地伸出双手，把严北溟按坐在沙发上。为了不使严有丝毫紧张，他也重新坐下。

严北溟继续汇报道：“我协助黄绍竑主席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代草《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加强刊物宣传。黄主席为轮训部队基层干部，在刚成立的‘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下设立了一个政治指导室，他怕政训大权被复兴社分子夺去，特派我兼任该指导室主任。我借此机会，延揽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如王平夷、黄继武、萧卡、童超、沈任重、周凯等，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件事引起了 C·C 系和复兴社分子的更大敌视。”

“浙江的 C·C 系和复兴社有没有矛盾？”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不过是争权夺利，狗咬狗罢了。前年冬天，杭州沦陷，后方震动。以宣铁吾为首的省保安处——他们属于‘军统’，系复兴社骨干——为了乘机扩充实力，指示诸暨、绍兴等县招兵买马，发动在乡军人组织壮丁队或自卫队，准备‘打游击’，与此同时，以方青儒为首的省党部——他们属于中统，为 C·C 系把持——也不甘寂寞。号召各县党部运用抗敌后援会一类组织，发动群众，组织队伍，跟省保安处分庭抗礼。”

“这下子，可有热闹好看了。”

“可不是吗？如省党部浙东特派员、诸暨县党部实际负责人、C，C 骨干傅文象，立即奉命执行，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大量吸收青壮年进行所谓的‘游击训练’。诸暨是复兴社的巢穴之一，宣铁吾和他在保安处的重要骨干都是诸暨人，岂能袖手不管？便挑动在乡军官周破浪、杨步飞、翁国华等跟傅文象大起磨擦。再加上傅文象在进行过程中有些专擅，就此种下祸根。周破浪等以傅文象不懂军事为由，多次暗示他适可而止，让出领导权交军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